

现代性的变奏与个体化社会的兴起

——乌尔里希·贝克“制度化的个体主义”理论述评^①

李荣山

内容提要 “风险主题”和“个体化主题”是贝克“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两个重要论题。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前者,而或多或少忽略了后者。有鉴于此,本文以贝克夫妇的《个体化》一书为基础,详细介绍了贝克的“制度化的个体主义”理论,并分析了其理论意义与局限。

关键词 现代性 变奏 个体化

乌尔里希·贝克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活跃于西方社会理论界的一位重要理论家,他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无论在理论界还是社会政策的实践中,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工业化和全球化的高歌猛进暴露出了工具理性自身引起的一系列问题,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激起了人们对理性决策的深刻反思,也为应对这些问题提供了一种极富启发的视角。

斯科特·拉什认为,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也即“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其实包含着两个特色主题:其一是“风险主题”;其二是“个体化主题”。^②我们可以从广义和狭义角度来理解风险社会理论。狭义的风险社会理论仅包括“风险主题”,而广义风险社会理论则包括“风险主题”和“个体化主题”。从这个层面上说,贝克那里的狭义风险社会理论并不是一种突生的、原发的理论,而是从属于一种更加本源和抽象的“自反性现代化”理论。风险社会是自反性现代化的后果之一,自反性现代化的另一个后果是个体化。贝克认为,学界对《风险社会》一书的讨论,主要侧重有关风险的论述,极少或根本就不关注有关个体化的论述。^③而个体化理论是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广义

风险社会理论)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有关第二现代性的理论的一部分。^④拉什也看到,在德语学界,人们是通过结合这两个主题来理解贝克著作的。而在英美学界,尽管风险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个体化主题实际上却被忽略了,而后者其实更为重要。^⑤与英美学界类似,我国学界大多也是在狭义而非广义层面上来阐发和应用风险社会理论的。“风险主题”和“个体化主题”并非孤立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有鉴于此,本文着重解读贝克的个体化理论,以期为我们完整把握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做一点贡献,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理论意义与局限。

自反性现代化与个体化进程

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是社会学的经典主题之一,从孔德开始,许多社会学家认为,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有一个“断裂”。“断裂”并不是一刀两断,前后不相接,而是强调现代社会在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人的行为意识诸方面与传统社会有较大差别,尽管社会学家们看到的差别并不一致。^⑥现代性大约起源于17世纪的欧洲,此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⑦从现代性

的兴起到今天已有 300 年左右的历史。在这 300 年间,西方社会乃至世界社会都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化,在此过程中,特别是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出现了哪些新的“断裂”?如何来解释这些“断裂”?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现代性的发展是否超出了自身?换句话说,是否在现代性之外产生了某种后现代性?笼统地说,对于这个问题,至少出现了两种立场。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历史的发展已经超越了现代时期,进入了后现代时期,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展现出了不同于现代社会的特质,也即后现代性。现代主义者则认为,“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迈进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性时期,而是正在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其中现代性的后果比从前任何一个阶段都更加剧烈化更加普遍化了。”^⑧现代性是一个远未完结的过程。吉登斯和贝克是这种立场的代表。吉登斯认为,社会的发展并没有脱离现代性制度,并向一种新的不同的社会秩序转变,而只是迈向了一个更高的阶段,也即激进现代化或高度现代化阶段。贝克则大致以 20 世纪后半期为界,把现代时期划分为第一现代性时期和第二现代性时期,或者说工业社会时期和风险社会时期。认为前后两个时期之间,社会和政治图景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为打破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无休止、无结果的争论,破除概念差异造成的迷雾,深入现代性变动的本质,贝克和吉登斯、拉什共同提出了“自反性现代化”理论。^⑨

自反性是现代社会自身的动力机制。自反性现代化指“创造性地(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这种创造性毁灭的对象不是西方现代化的革命,也不是西方现代化的危机,而是西方现代化的胜利成果。”^⑩风险社会或第二现代性社会的形成,不是资本主义危机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大获全胜的结果,是现代化进程本身高歌猛进的结果。故此贝克引孟德斯鸠的话说“制度毁于其自身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反性的作用机制类似于启蒙理性的二律背反逻辑:理性破坏了它自身所激发起来的人性,被启蒙摧毁的神话,却成了启蒙自身的产物。^⑪在自反性现代化阶段,风险恰恰是工具理性胜利的产物。因此,自反性现代化是这样一种情形“工业社会悄无声息地在未经计划的情况下紧随着正常的、自主的现代化过程而来,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完好无损,这种变化意味着现代性的激进化,这种激进化打破了工业社会的前提并开辟了通向另一种现代性的道路。”这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是一种“潜在副作用”的模式。因此,贝克既不赞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其自身掘墓人”的说法,也不赞同功能主义者的观点,因为他

们认为,不发生革命或社会剧变,是不可能产生新社会的。^⑫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贝克区分了“自反性”(reflexivity)和“反思”(reflection)。反思指现代化自我反思意义上的知识和科学化增加,而自反性则是自主性现代化的动力,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的转化是一个“自主的、不受欢迎的、看不见的”自反过程。这种自反过程是理性本身的自反吗?或者说,恰恰因为工具理性的完美无缺导致它成为自身的掘墓人?贝克认为,恰恰相反,工业现代性的病根不是理性过多而是理性的缺乏和非理性的盛行。只有通过理性的激进化以吸收被压抑的不确定性才能治好这种疾病。^⑬如此看来,贝克并非反理性主义者或非理性主义者,而是彻底的理性主义者。

个体化是第二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之一。“简单(或正统)现代化归根到底意味着由工业社会形态对传统社会形态首先进行抽离,接着进行重新嵌合,那么自反性现代化意味着由另一种现代性对工业社会形态首先进行抽离,接着进行重新嵌合。”^⑭经过二次抽离和再嵌合的第二现代性社会,既是一个风险社会(狭义),也是一个全球化社会,更是一个个体化社会。个体化早已有之,^⑮但个体化社会的出现则是高度现代性的后果。只有到了 20 世纪下半叶,“为自己而活”这种原本只被少数人期望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模式,才成为了普遍要求,从边缘和从属地位向中心地位靠拢。其结果就是,“现代社会凭籍其内在活力暗中削弱着阶级、阶层、职业、性别角色、核心家庭、工厂和商业部门在社会中的形成。”^⑯那些直至 20 时期后半期一直支撑着西方民主国家和经济社会的集体或团体的意义之源正在枯竭、解体。许多原本可以依靠集体或团体来应对的问题,越来越多地抛给了个体。“个体化”概念包括两层重要含义^⑰:一方面,它意味着既有社会形式的解体,比如阶级、社会地位、性别角色、家庭、邻里等范畴的日趋弱化,国家认可的标准化人生(normal biography)、参照图式和角色模式的崩溃。另一方面,它指的是现代社会新的要求、控制和限制被强加给了个体。

因此,个体化并非个体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自反性的、强迫的结果。或者,用鲍曼的话来说“如今,像以往一样,个体化依然是命定之事,而非可以选择之事;在个体自由选择的范围内,逃避个体化和拒绝参与个体化游戏这种选择,显然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⑱这也是贝克区分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和个性化(individuation)的原因。同时,个体并非自足的单子,也不是自我中心、我行我素的,而是越来越多地卷入与他人和制度的牵连,甚至是全体范围内的牵连。“现代社会的核心制度,包括基本

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以及维系这些权利所需要的有薪工作、培训和流动,是为个体而非群体配备的。”同时,“在高度现代性下,共同体和相互关系的维持,不再依赖稳固的传统,而是靠一种吊诡的互致个体化的集体(collectivity of reciprocal individualization)。”^①每个人都有权为自己而活,但在每一种具体情况下都必须重新与他人协商共同生活的约定。有鉴于此,贝克批判了新自由主义意义上的“个体化”,提出了“制度化的个体主义”(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②概念,强调个体和制度的辩证关系以及个体从工业秩序下脱离出来并寻求重新嵌入的后果,强调那种“有赖于制度的个体状况”。新自由主义假定的自给自足的人的形象与日常经验和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不符。总之,贝克认为,在第二现代社会中,个体在历史上首次成为了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单元,个体化正在变成第二现代社会自身的社会结构。

个体化进程中社会和个人的形貌变迁

贝克把个体化进程的特点概括为四点:(1)去传统化;(2)个体的制度化抽离和再嵌入;(3)被迫追寻“为自己而活”缺乏真正的个性;(4)系统风险的生平内在化(biographical internalization)^③。这四点涉及结构和个体的形貌变迁。从结构和个体的关系角度来看,个体化意味着“抽离”(从旧的社会结构中脱离)和“再嵌入”(新的整合形式和控制形式出现)。这里,不能从稳定、刻板的意义上来理解结构—个体关系,否则结构和个体这两个概念就都变成了贝克所谓的“僵化范畴”。因为,个体化正在变成社会结构,同时个体也必须在其生命历程中去解决系统矛盾。结构和个体之间是一种流动的、动态的关系。那么,在个体化进程中,结构(社会秩序)和个体的形貌出现了哪些重要的变化呢?

1. 从系统政治走向亚政治

在个体化进程中,政治图景发生了重要变化。其变化路径可以概括为:从系统政治(或正式政治)走向亚政治(sub-politics)或者说,出现了与国家政治对立的“自我政治”。以往的政治格局正变为非政治性的,曾经是非政治的东西正变为政治性的。

过去人们把政治等同于国家,等同于由议会、政府和政党组成的政治体系,也即等同于系统政治。但是,系统政治长期以来既不能充分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求,又限制了政治体制以外的新的政治参与的要求,于是逐渐丧失其对政治领域的垄断地位。这就为亚政治或自我政治的兴起打开了缺口。亚政治指介于政治(正式政治)和非

政治之间的政治形态,是不稳固的、混杂的。^④可以简单理解成系统政治以外带有政治意味的组织和行为。具体来说,可以归纳成三种:一是经济、科学、技术、家庭、工作以及日常生活等原本被认为属于政治领域以外的、受政治保护的领域,越来越具有政治意味,越来越频繁地卷入了政治冲突。二是新兴的各种社团和形形色色的运动(比如生态保护运动、反核运动、同性恋运动和女性运动等)越来越具有政治倾向性,或者其行动形成了新的政治关注点。三是隐退主义的非政治行为反过来也产生了政治后果,这可说是亚政治的极端形态。其中年轻人的隐退主义立场最为典型。年轻人关心的很多问题被既有政治排除在外,这就导致了年轻人对政治的厌恶。他们采取“用脚投票策略”,也即出于对政治的失望或抵触而选择离开或不合作。他们宁愿“呆在家里什么也不做”,娱乐消费,享受人生,也不愿意介入政治。他们的行为看似是非政治的,实则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是一种“年轻人反政治的政治学”。只要他们始终如一地坚持这种隐退策略,既有政治制度就会逐渐变成僵化范畴。^⑤

亚政治带有很强的地方性和具体性,一般不会得到政治家的承认,但是它使政治的概念、地位和媒介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个体化角度来看,这种变革最重要的特征是个人的重返政治。个人重返政治使得以往的“明晰政治”变成了“模糊政治”。左派和右派、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隐退和参与,这些以往明晰的政治范畴越来越模糊,呈现出矛盾、混合的多样性。如此一来,就连政治领域中的关键问题——不平等问题——也呈现出了不同的形态。一方面,尽管发达国家社会不平等的结构非常稳固,但不平等问题却不在被认为是阶级问题,从政治上处理此问题时也不再把它当作阶级问题,出现了“不平等的个体化”。比如,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也卷入了不平等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平等问题已经“超越了地位与阶级”。^⑥

2. “自我文化”现象的兴起

文化领域兴起了“自我文化”现象。第一现代性的文化基础是奠定在民族—国家、阶级、家庭和族群之类的既定集体身份认同之上的。根据有关家庭、邻里、宗教和社会认同的旧有文化价值观,文化总是社会性的并且在总体上调节着个人的行为,否认个体具有文化上的重要性。个体的兴起冲击了这种文化价值观,关于道德和责任的全新想象正在逐步形成,一种全新的“为自己而活”的“自我文化”出现了。此前的文化,无论是资产阶级文化还是无产阶级文化,无不以阶级划分(集体)为社会标识的根

基,而“自我文化”则强调“为自己而活”这样一种价值观。个体本身具有了无需依托集体的独立价值,获得了文化上的重要性。自我文化有三个重要特征:^⑤

首先,在审美生活方式的营造过程中存在一个自我的表演。把自己的生活打造成具有一定审美味道的生活成为年轻人的一种主流思潮。

其次,自我文化彰显出一种内在化并具有实践意识的自由理念。只有当自我文化碰到困难时,才会被限定在确定的目标和忠诚形式之内(如政党、工会或教会组织等)。

再次,自组织不仅仅指向政治行为,而且指引着人们的各种行动。自组织与简单的参与不一样,后者假定存在一个司法与权威的等级划分,并且明确规定参与各方都是哪些人。自组织恰恰要求那些在参与过程中被否定掉的东西成为指引人们行为的准则。换言之,人们要辨别哪些东西对他们来讲是重要的。

“自我文化”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一是对自我的认知,二是对自我取向的个体的约束。一方面,个体有权追求“为自己而活”;另一方面,个体也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不幸与没有预料到的事情)负责,并且能够与他在文化场域中求同存异地生活。因此,自我文化不等于自私自利、自我放纵,而是自我价值与责任伦理的统一。在“自我文化”的关照下,家庭、男女关系、贫困和政治忠诚等具有了全新的文化内涵。它们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具有明确内涵的文化现象,而是“亦此亦彼”的、交织缠绕的文化现象。因此贝克说,自我文化是一个明白无误的模糊问题。^⑥

3. 后家庭时代的家庭

在个体化进程中,无论是家庭的组织结构、劳动分工和夫妻关系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首先,传统家庭的垄断地位被打破,新的家庭形式出现了。这些新形式包括:非正式婚姻或没有孩子的婚姻;单身父母、再婚,或同性伴侣关系;暂时的关系或终生的友谊关系;在不同的家庭生活甚至在不同城镇生活。贝克把这些中间的、次级的或流动的家庭形式称作“后家庭时代的家庭”。^⑦其目的并不是独自生活,而是在于发展不同种类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后家庭时代的来临并不意味着“家庭的终结”,而是家庭获得了个体化的新形式。

其次,婚姻关系也出现了深刻变动。贝克追溯了婚姻的社会史。有关婚姻的法律制度在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一个彻底的转变,从把婚姻解释成某种超越个体的东

西,到把它完全解释成个体性的东西。婚姻被制度化为某种个体化的程序。因此,以往婚姻首先是作为一项独特的制度居于个体之上的,如今却越来越成为结成婚姻关系的个体的产品和构造物。“个体化是婚姻的底本。”不过,即便是全新的个体婚姻秩序,也不全是个体化及其愿望的产物,还会受制于制度性的法令,也离不开教育系统、劳动力市场和养老金制度这些必要条件。^⑧这是“制度化的个体化”在婚姻方面的体现。

再次,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男女双方的自我形象与生活计划也呈现出了新的面貌。在婚姻关系中,家庭内部的分工越来越成为紧张和冲突的来源,这与男女双方的个人形象和生活计划有重要关联。

4. 从“标准化人生”到“选择性人生”

在第一现代性下,由阶级、地位、宗教、传统和家庭等构成的社会秩序规定着个体的行为,个体能动性发挥的空间较小,其生命轨迹往往表现为国家、宗教或传统认可的“标准化人生”(normal biography)模式。随着既有社会形式在个体化进程中的衰弱或解体,原来的标准化人生模式、参照图式和角色模式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选择性人生”,或者说“自反性人生”、“自主人生”。

“自反”、“自主”和“选择”分别代表着这种新的人生模式的不同维度。“自反的人生”指这种人生模式是自反性现代化的结果,而不是个体自由决定的结果。贝克引萨特的话说“人注定要个体化”。同样,这种人生模式也是注定的。“自主的人生”意味着如今个体必须成为自我人生道路上的舵手,部分地为自身提供行动规范或指导方针。“选择的人生”则意味着,个体必须在自主的基础上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终生面临选择。

选择或自主的人生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个体前所未有地获得了主宰人生的机会;另一方面,这种自主又不是绝对的自主,绝非“在真空中任意戏耍的行动逻辑”。自主和选择始终处在“生活表层之下那个高效的、紧密编制起来的制度性社会”中,甚至明明无法决定也必须做决定。此外,选择或自主的人生并不必定成功,它始终是一种“风险人生”,一旦选择失误,就可能导致“破裂的人生”。^⑨

社会整合如何可能

高度个体化的社会如何整合?这是霍布斯问题在当代的重现。在个体化进程中,工业社会制度已经开始动摇了,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文化价值观乃至个体的人生模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动,“个体化”的烙印无处不在。对

一个奠基于“个体化流沙”之上的社会,共同生活如何可能?贝克认为,要保持现状或一个筋斗翻回重前,缺乏合法性基础的支持。社会整合只有面向未来才有可能。

关于高度个体化社会的整合问题,目前主要有三种策略,贝克总结为三条道路,即求诸超验共意(transcendental consensus)、共同物质利益或国族意识。但贝克认为,这三条道路同样缺乏合法性基础,因而变得越来越行不通了。第一条道路试图通过价值来实现整合,它是从涂尔干到帕森斯的古典社会学的驱动力。但是,文化观念的多元化蚕食了价值共同体自我维持与不断更新的基础。第二条道路把整合的基础建立在分享共同物质利益之上。但这种观点的基本假设本身是有问题的,混淆了问题本身和问题的解决之道。第三条道路诉诸国族意识。但这条道路同样也行不通,因为随着民族认同的松动,国族整合也随之崩溃了。^{③0}

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呢?贝克认为至少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我的基本观点是:如果说高度个体化的社会可以整合的话,那么首先必须对这种状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其次,只要人们在面对生命中的重要挑战时(失业、自然灾害等)能够被成功动员与激发。在旧有的社会性正在‘蒸发’的地方,必须对社会进行再造。因而,只要个体的突围没有受阻乃至倒退,那么整合就是可能的。只要我们有意识地利用好这种情势,努力铸造新的、政治上开放的、创造性的纽带和联合,整合就能实现。问题在于我们是否仍然有力量、想象力和时间来进行这种‘政治的发明’,这个问题是事情成败的关键所在。”但“政治的发明”是否能成功则未有定数。“或许最终的结果证明,个体化与整合其实是互不相容的。”^{③1}

理论评价与反思

贝克的个体化理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就贝克自身的理论而言,个体化理论弥补了风险社会理论(狭义)的许多空缺,丰富了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广义风险社会理论)。其次,贝克“把个体的诞生描述成连续性、压制性现代化的一个方面,从而把埃利亚斯关于个体诞生的阐述给‘历史化’了”。^{③2}通过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的结合,贝克夫妇详细阐述了个体化进程中社会 and 个人的形貌变迁以及个体和制度在此过程中的纠结缠绕,并探讨了高度个体化社会的整合问题,为把握西方社会的变迁提供了一种新的极富启发的视角。再次,倘若按照贝克的看法,把个体化作为一种全球趋势来审视,对理解非西方社会也不无助益。不过,贝克也指出,尽管个体化是我

们时代的一种全球趋势,但个体化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欧洲的个体化模式只是其中的一种。不能认为个体化进程在世界各地都呈现出相同的基本模式,都采取了相同的制度形式,都转化成了相同的生平模式,并引起了同样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也不能认为欧洲的个体化路径是原生的,而欧洲以外的个体化则是派生的。贝克区分了现代性和个体化进程的四种理想类型,并特别强调了东亚和中国个体化的特殊性。^{③3}这些论述,对我们深入把握个体化进程的多样性、把握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如果有的话)的特点和后果,具有相当的意义。

不过,笔者以为,除此以外,个体化理论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制度化的个体主义)破除了帕森斯式的“角色人”假设和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个体观念”,并动摇了以往社会理论中的种种“僵化范畴”。随着个体化社会的兴起,许多概念——比如家庭、阶级、邻里、贫富——都成了僵化范畴,丧失了解释的效力^{③4}。个体化理论挑战了社会理论的概念基础,这就难怪拉什认为贝克的“个体化主题”比“风险主题”更重要。

关键在于,像“亚政治”、“后家庭时代的家庭”这样的概念,比起以往的“僵化概念”来,其优越性体现在哪里呢?或许贝克会解释说,以往这些概念要么遮蔽了个体,要么无法把握个体与制度之间流动的、辩证的关系。总而言之,这些概念是二元对立的,而不是二元统一的,而“制度化的个体主义”概念弥补了这一缺陷。吊诡的是,贝克并没有把“个体”这个早已有之的概念当作僵化范畴,反而把它用作其理论的核心概念。按照贝克的逻辑,“制度化的个体主义”可说是两个僵化概念(“个体”和“制度”)的组合,这一组合的优越性比起这两个单独概念有何优越性?是弥合了个体和制度的对立吗?如果贝克同意这种看法的话,那么他的策略就是用对立概念的组合来弥补各自的偏颇。

如果以上论述成立的话,那么这种策略的逻辑基础就在于:用二元组合来打破二元对立。但二元组合和二元对立的基础都是二元划分。即便二元组合能够克服二元对立,也无法摆脱二元划分的窠臼。其结果就是,为了打破二元对立,就得生产越来越多的二元组合概念。韦伯抱怨的“方法论瘟疫”,难保不会变成“概念瘟疫”。这种策略的基础在于西方特有的理性文化中(特别是笛卡尔以来)的二元话语体系。这种二元话语体系在探讨一些根本问题时显得困难重重。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贝克在“制度化个体主义”框架下探讨价值虚无、自由和整合问题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只能求助

于一种乐观的“关于可能现实的感觉”。^⑮倘若跳出西方的传统来看,会发现什么问题呢?台湾的叶启政教授多年来致力于破除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的二元对立“迷思”,立足于中国古人的天人合一观,提出了“修养社会学”的概念,试图以“修养”和“孤独”作为基本概念来重构社会研究典范,对汉语学界理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内在困境和“社会学的本土化”颇有启发。^⑯关键在于,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之下,如何结合历史与现状,真正跳出“东西文化之争”的紧箍咒,使具有启发性的“概念形成”(concept formation)落地生根。☞

① 贝克夫妇把他们各个时期写的有关个体化论题的论文集结成《个体化》一书,本文的分析以该书为基础,并参考了贝克其他研究的相关部分。参见 Ulrich Beck and Elisabeth Beck-Gernsheim, *Individualization: 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 and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London;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2002. 中译见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李荣山、范譔、张惠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②⑤ 斯科特·拉什《非线性模型中的个体化》,载《个体化》。

③⑩⑪⑫《作者自序:制度化的个体主义》,载《个体化》。

④“中文版序”,载《个体化》。

⑥ 参吉登斯提出的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断裂论”的解释。吉登斯认为,断裂是指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在形式上有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 2000 年,第 3 页。

⑦⑧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 2000 年,第 1、3 页。

⑨⑩⑬⑭⑮ 贝克、吉登斯、拉什《自反性现代化》,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第 5、6、43、5、5-6 页。

⑩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第 5 页。

⑮ 贝克指出,个体化并非 20 世纪下半叶特有的现象,在早前的历史阶段中也出现过,比如在文艺复兴中,在中世纪宫廷文化中,在新教的内在苦行主义中,在农民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的过程中,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家庭代际纽带的松动过程中。见《个体化》,第 235 页。

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李荣山、范譔、张惠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2、1-2、112-113、10、20-21、21-22、23 页。

⑳B31 鲍曼:《序二:个体地结合起来》,载《个体化》。

㉑ 这个概念借自帕森斯,但在贝克那里,制度化的个体主义已经不再是帕森斯式的线性自我再生产系统,而是一个非线性的、开放式的、极为矛盾的持续过程。

㉒ 参见贝克《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 2004 年,第 229 页。

㉓ 参见《个体化》第十二章。

㉔ 参见《个体化》第三章。

㉕ 参见《个体化》第四章。

㉖ 此处对“个体化进程中结构和个人的形貌变迁”的四点归纳并不完备,只涉及主要的、贝克夫妇论述相对丰满的部分。《个体化》一书还涉及了个体化进程中的人口、老年人、女性、死亡、医疗与健康等多方面问题,兹不一一赘述。由于这是一本论文集,各章节基本上是由单篇文章构成,内容重复的地方不少,论述体系和问题的层次也不是特别清楚。

㉗ 这四种类型分别是:欧洲的现代化——调控型(regulated)或协调的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民主;制度化的个体主义(福利国家);世俗化社会。美国的现代化——自由的或不协调的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民主;制度化的个体主义和后世俗宗教信仰。中国的现代化——国家调控的资本主义;后传统权威(authoritarian)政府;不完整的制度性个体化以及多元宗教社会。伊斯兰现代化——调控型资本主义;传统极权政府;单一宗教社会禁止个体化。见“中文版序”。

㉘ 参见《个体化》第十四章。

㉙ 叶启政说“见山是山(如结构功能论);之后,见山不是山(如结构二元性或二元论),而终于见山又是山了。最后这个山的呈现样貌,就必须靠孤独与修养二概念所发扬的典范来证成。”又说“由孤独与修养二概念所揭橥出来的论述典范,很明显的,不但不会把主体回归到个体性来彰显,而且,甚至可以把主体的概念完全扬弃、撤销的。人的修养,尤其予以孤独化,并不是用来证成所谓的‘主体性’的,因为这些概念内涵着必然需要有一个‘客体性’来与之相对着。毋宁的,修养所臻至的是一个与‘体系化’结构或者相互涵摄、或者把它推移开、或者甚至是完全扬弃的圆融境界。”见叶启政《进出“结构—行动”的困境》,(台北)三民书局,2000 年,第 579 页。更集中的论述参叶启政《迈向修养社会学》,(台北)三名书局 2008 年。

作者简介:李荣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南京 210013

(责任编辑:毕素华)